

孙中山为何视同盟会为革命党而非政党

肖铁肩, 谭先龙

(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欧美政党未能提供革命党是政党的范式, 日本朝野人士把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称作革命党, 当时国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以及利用会党的策略, 使孙中山把同盟会称为革命党而不是政党。

关键词: 中国同盟会; 革命党; 政党; 缘由

中图分类号: K25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1-0062-05

孙中山1905年8月联合国内外的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把这一革命团体称之为“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1](138)}。而他认为政党是在民国成立后的事,“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一切建设,尚未完备,今日实为革命草创时代,然有一事,吾等深可引为庆幸,实生前途绝大之希望,即政党成立是也。”^{[2](4)}关于同盟会的性质,史学界已公认它是政党。为什么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眼中,同盟会是革命党而不是政党呢?对这一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孙中山本人是从政党的活动方式和功能等方面来界定革命党与政党的,如李永玲所言:“可以说,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孙中山即重视政党的作用,但是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前,孙中山从功能上把‘革命党’与‘政党’作了截然不同的区分。革命党,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制度而奋斗的组织。政党,在宪法指导下通过参与政治竞争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组织。”^{[3](74)}这种考察的逻辑,主要依据是孙中山多次对革命党与“政党”所作的解释:“革命党之事业,必须流血冒险,牺牲性命财产,才能做成革命之功。”^{[2](35)}“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4](469)}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但笔者认为还不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因为“某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如果不是放在整个社会之中,那么就无法理解”^{[5](50)}。本文拟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粗浅的全面分析。

一、孙中山效法的欧美政党未能提供革命党是政党的范式

政党是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的产物。它的产生是在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英国164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但在1673年,英国国会因王位继承问题形成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政治集团,后来演变为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两大政党在议会中互相攻击,互相牵制,轮流执掌国家政权,被人们认为是两党制的起源。近代美国的政党是在革命成功后,制定美国宪法时形成的。由于对国家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形成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人。到19世纪50年代前后演变为共和党和民主党。18世纪末法国发生大革命,在“国民议会”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如保王党、斐扬派、艾贝尔派、忿激派等各种政治派别。这些政治派别先后在法国执掌国家政权,历经了封建势力的复辟,到1901克里蒙梭组建法国激进社会党才形成了法国的多党制。从这些欧美国家的政党形成来看,他们都在革命胜利后,在议会中诞生,利用合法斗争的手段来执掌国家政权。正如陈宇翔所言:“西方近代政党大多源于各国已建立的议会制度。政党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在议院里获得多数,从而制定了代表国民的一般利益的虚构,反对党也接受这个虚构,形成了‘政党政治’。就是说,各政党在议会这一制度的范围内,公开地为取得权利而进行竞争。议会实际上是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6](11-12)}可以说欧美的政党提供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政党范式是议会式政党。

孙中山早年接受了西方教育。他在檀香山的求学,对他的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有了师法西方,改造中国的理想。”^{[7](30)}但是,他的思想“不是通过中国自身的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它是适应中国国内

收稿日期: 2006-12-18

作者简介: 肖铁肩(1947-),男,湖南涟源人,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党史及政党理论、中共党史及党的建设

革命形势的要求从国外引进的”^{[7](10)}。从当时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手段来看, 没有给各国提供革命政党这一斗争的新工具, 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给资产阶级革命者提供政党的理论渊源。孙中山不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政党的理论, 他的革命理论就只能从西方来获得, 而欧美的革命理论给他提供的却是另样的政党观念。“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的输入与传播, 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观念, 这种政党观念与我们现今所认识和理解的政党观念大相径庭。当时的政党, 是指合法的、公开的政治团体或政治派别; 也只有公开进行合法活动的党派, 特别是议会中的党派, 才被称作政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秘密的、非法的, 尤其是以革命手段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党派, 不是政党。”^{[8](47)}那么, 当时有没有用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权的政党呢? 只要考察世界的革命运动史, 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确实存在着用革命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权的政党, 那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政党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建立的, 它公开宣称用暴力手段推翻现存剥削阶级的政权。并且孙中山于1905年5月中旬访问社会党国际执行局, 请社会党国际执行局接纳他的党为成员。那么,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效法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呢? 一方面, 孙中山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虽有所接触, 但接触的不多。这一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出入中国, 只是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9](44)}另一方面, 无产阶级政党在孙中山同盟会革命时期未有革命成功的事例。这就不能引起孙中山对这一政党的重视。再说, 当时世界革命的潮流还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尾声, 无产阶级的革命时代还刚刚开始, 大的革命风暴没有到来, 革命党是政党的理论还未能解决。尽管孙中山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人, 当时, 向西方学习来改造中国, 我们想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学习一种革命未成功的理论的。

孙中山想效法欧美的革命, 而欧美的政党政治却未能提供革命党是政党的范式。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就谈到这一情况:“从前何以不从师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因为未有模范, 未有先例之故。”^{[10](436)}所以, 孙中山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手段出发, 把他所领导的同盟会称为革命党, 而不是政党。这一情况后来得以改变, “强调革命党和政党之间区别的观念, 到了孙中山晚年, 才发生了变化。”^{[11](38)}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 他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 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没有严格区分革命党与政党。他在北上的途中说“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

党”。^{[12](280)}同时, 他又把它称为政党:“非有一坚实之政党, 国事终不可为。我现在竭力造党, 使民众得训练。”^{[13](p.474)}孙中山政党理论的不成熟给他的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民国初年革命党人附和“革命军起, 革命党消”的论调, 革命阵营发生分化,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与这种理论有一定关系。

二、日本朝野人士把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称作革命党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逐步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 不像欧美只有一个。在实现中国独立、民主的革命目标的过程中, 反革命阵营过于强大, 而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过于弱小, 资产阶级本身又具有先天的软弱性, 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要实现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需要联合外部力量, 至少要争取列强对革命保持中立。日本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 因而, 在革命的过程中利用日本朝野人士支持中国革命一直是孙中山的策略, “孙中山自1895(明治二十八)年赴日以后, 十余次出入日本, 滞留日本达十余年, 这就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日本渡过的。孙中山将日本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据地, 并对日本寄予很大期望。”^{[7](3)}既然, 孙中山想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 那么, 他就会在革命的某些方面来迎合日本朝野人士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而日本朝野人士一直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称为革命党。

1895年10月兴中会发动了广州乙未起义, 这次起义因事泄失败。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 船过日本神户时, 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 内有一则新闻, “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便对陈少白说, “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 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 其义甚佳, 吾党以后称革命党可也。”^{[14](1)}这则史料虽反映了中国革命党称呼的由来, 同样也说明了日本朝野人士最早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称为革命党。当孙中山伦敦蒙难后, 日本朝野人士开始在报刊、杂志上介绍孙中山, 对他进行了评价, 认为孙中山只有建立革命团体, 武装反清, “才会成为真正的革命党, 才会有一线光明。”^{[15](43)}在孙中山结交的日本友人中, 很多人宣传中国的革命, 如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和萱野长知等人于1906年9月创刊《革命评论》, “呼吁日本人同情、支援中国革命”^{[7](73)}。该刊对参加惠州起义牺牲的日本人士内田良介(山田良政)进行了介绍, 指出, “革命

党若取得最后胜利,山田君将作为新支那的伟勋者为支那国民永远铭记。”^{[15](74)}当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爆发后,日本寺内陆相派遣与中国革命党关系较好的儿玉、宫崎来中国进行考察,宫崎等返抵神户后,在《万朝报》上以“革命党领袖黄兴—在热带地区”为题,发表文章,介绍中国革命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7](93)}。这些资料反映了日本报界对中国革命党的宣传,而孙中山是非常重视宣传的:“用笔比用剑还有力,这是约翰海的通函能够防止瓜分中国,所已经证出的。”^{[16](300)}因此,为了达到利用日本报界对中国革命党的宣传效果,孙中山当然要把他所领导的同盟会称为革命党。同时,这些人都是日本有头有脸的人物,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他们,当然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并且孙中山本人也承认日本政府称其为革命党,如“此次日政府如此委曲优待^①,真出乎意料之外,诚为日本政府向来待革命党未有之奇典也”^{[17](463)}。从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朝野人士一直把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称为革命党。孙中山本来一直对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抱有期望,把日本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希望日本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保持中立。那么,在当时政党理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从利用日本朝野人士支援中国革命的策略出发,他把同盟会称为革命党是情理之中的事。

三、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缓慢发展。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上、中、下三个阶层,他们都要求对社会进行变革,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因而对革命要求的程度不同,逐渐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保皇”,实行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两派曾企图在革命力量上进行联合来达到各自的目的,终因革命目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是,两派要想“变革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首先是力量之间的较量过程,中国存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只有这笔巨大的政治资源被某种理论和体制所整合,中国社会的变革才有希望”^{[18](241-242)}。因而,两派在获取运动的政治资源方面,必然要发生冲突。

改良派形成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公车上书,后经戊戌变法而名声大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逃到日本进行保皇运动。两派为了各自的运动而争夺政治资源,因为“各种政

治行为主体只有拥有或者掌握了充足的政治资源才有指望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18](179)}。因此,两派之间进行着攻击。在两派斗争的初期,改良派占据着优势,1897年“7月2日,孙中山由伦敦启程,途经加拿大,于8月16日抵达横滨。这一时期,国内变法声势高涨,对旅居日本的华侨影响很大。兴中会横滨分会在当地华侨中的地位为康有为取代,横滨华侨对孙中山态度冷淡”^{[7](39)}。1898年,随着中国国内变法运动的开展,康徒宣扬康有为有大拜之望,华商趋炎附势,多与康徒接触。孙中山在横滨的势力便由康梁所取代。孙中山本人也曾多次谈到康梁的影响超过自己,如1900年7月10日与斯韦顿汉(英国在新加坡殖民地的官员—作者注)的谈话:“皇太后悬赏购缉康的头颅,他那头颅的价值三倍于我。”^{[17](196)}“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17](231)}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康梁在当时的影响确实超过孙中山的影响。这就必然会对革命党的势力范围进行侵占。

孙中山在复黄宗仰函中就谈到他与改良派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就功。”^{[17](229)}“弟近在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皇,已到过五六处,俱称得手。今拟通游美地有华人之处,次第扫之,大约三四个月后当可就功。”^{[17](240)}孙中山也对保皇党占领自己发展的革命势力范围情况进行了自责,“弟等同志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不能辞也。”^{[17](230)}

两派为了争取政治资源,从1900年至1907年进行了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保皇派在国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成立“保皇会”,鼓吹保皇救国理论。当时,梁启超写文章攻击革命,还宣称保皇“名为保皇实为革命”。革命派看到“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的情况,进行了反击^{[17](230)}。孙中山于1903年12月写了《敬告同乡书》,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派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17](232)}在1904年1月写了《驳保皇报书》,针对革命将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进行了批驳,指出“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17](234)}。特别是当立宪派以政党号召于国内时,革命派对这一代议政党制度进行了大肆的攻击。当1907年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成立之际,革命党人在《民报》上撰文讥讽,“政党者,摇唇鼓舌以政见上闻于朝,此其政闻社之由来欤?”^{[19](37)}通过论战,革命派最终获得了胜利,“而曾经被他们(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留日学

生中的革命分子一作者注)奉为导师的梁启超, 这时因为良心发现而放弃了他的暴力主义的‘准革命地位’, 这就终于为孙中山取得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提供了极好的机会。”^{[20](32)}

尽管通过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革命派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孙中山始终担心保皇派的力量会卷土重来, 时刻对其保持着警惕。在1914年9月1日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中告诫同志: “非由我中华革命党支部、交通部特别选派及其承认介绍者, 政府概不收纳, 界以政事, 使保皇败类计无所施。”^{[2](113)}这从反面佐证了当时保皇派给革命派所造成的影响。革命派是通过高举革命的大旗, 并对“政党”进行了攻击, 最终获得革命的政治资源的。那么, 要保卫这种胜利的果实, 孙中山就不得不把他所领导的同盟会称为革命党而不是政党。所以, 我们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党’与‘革命党’之分, 渊源于19世纪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别”^{[21](76)}。

四、出于利用会党的策略

天地会据说创始于清康熙年间。乾隆时, 哥老会相继出现。天地会后来叶分两支, 盛于东南沿海的称三合会(三点会), 兴于长江流域的称哥老会(哥弟会)。鸦片战争后, 随着海外华侨的增多逐渐传到海外华侨的聚居地, 在海外统称洪门。原先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结社, 后来逐渐成为互助性的团体。参加天地会的人员成分复杂大多出自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具有不满现实的思想。“这些社会地位卑贱被统治者视同匪类、目为莠民、生活极不安定、最无保障的游民, 受秘密结社的传统影响, 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一起, 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22](4)}。到了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时, 他们往往成为起义的主要发动者。而孙中山的革命排满的思想与他们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 所以, 在相同的反清目标下, 会党就自然成为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依靠力量, “后来也成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一种社会基础”^{[20](19)}。

中法战争后, 广东地区的会党活动相当频繁, 经常发生会党抗捐抗税起义, 这些起义对孙中山影响很大, 产生了革命“应该以改良会党为入手办法”的思想,^{[23](19)}因为, 他看到这样的社会现实, “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 只有会党中人耳”^{[24](172)}。他还在1905年2月与旅比中国留学生的谈话中谈到: “但我同志必须能指挥下等社会有组织之团体(会党一引

者注), 而后于事有济。”^{[17](271)}他甚至在中国同盟会总章第五条中规定: “凡国人所立各会党, 其宗旨与本会相同, 愿联为一体者, 概认为同盟会会员。”^{[17](284)}从这些史料, 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会党这股民间反清力量是非常重视的。

在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中, 有许多革命志士与会党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孙中山称为“莫逆”的郑士良为三合会头目之一。当时被称为“四大寇”的尤列也是会党分子。同时, 孙中山本人为了联合洪门力量来反清, 在其舅父钟永年的介绍下毅然加入洪门致公堂, 被封为“洪棍”。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里, 其会员大半是会党分子和兼具会党身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香港总会的会员中, 现有案可查者为49人, 除了7人身份不详外, 其余42人中就有会党分子14人, 约占总数的30%^{[25](105)}。

会党参加了辛亥革命前的多次武装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家运动会党起事, 始于1895年乙未广州一役。同盟会成立后, 孙中山于1907-1908年在两广云南组织了几次起义, 使用的力量主要是会党。钦廉发难、镇南关起义会党都是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这是由于“会党通常都拥有武器, 各种反抗方式中, 武装斗争是其首选。更何况有些本来就出身行伍, 是社会现存的一支武装力量。……革命派是抱定了走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 迫切需要一支武装力量, 更何况革命派偏重于军事冒险。所以, 会党自然被看成是最理想的对象了”^{[22](5)}。当然, 会党也有着很多缺陷, 如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流寇意识、散漫无纪律等等, 革命党人常常感叹“会党发动易, 成功难; 既成而器悍难制, 不成则徒滋骚扰”^{[26](11)}。

总之, 孙中山要想利用民间这股强大的、现成的、具有反清精神的武装力量, 就不能不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来满足会党的要求, 因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 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 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27](58)}。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发展来看就能证明这一点,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以“排异”为主导的民族主义, 以后逐渐过渡到以“民族权力”为主导的民族主义, 他提出了“就算汉人为君主, 也不能不革命”的思想^{[17](235)}。那么, 为什么他一直还把“驱除鞑虏”作为辛亥革命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呢? 这就是孙中山要在革命纲领中来体现会党“反清复明”的宗旨, 达到利用会党这一政治资源的目的。把同盟会称为革命党而不是“政党”显然是符合会党的要求的, 这就是孙中山一再称同盟会为革命党, 而不是政党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在对待孙中山把同盟会看成是革命党而非政党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不能仅凭他本人对革命党与政党的界定来探讨这一历史现象,它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政治家不是科学家,他们的言辞必须要考虑到为其目的服务,往往是言不由己或是善意的欺骗。本文从以上四个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肤浅的探究,还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 [1] 冯自由. 革命逸史(第二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李永玲. 孙中山与“以党治国”[J]. 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6): 63-65.
- [4]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5] 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6] 陈宇翔. 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研究[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7] 愈辛淳.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8] 肖铁肩. 工人阶级政党论[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4.
- [9] 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传[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10]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1] 赵扬. 孙中山的政党观发展略探[J].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4): 21-25.
- [12]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3]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4] 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5] 愈辛淳.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16]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7]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8] 王邦佐. 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
- [19] 樊邦. 哀政闻社员[N]. 民报, 1907, (23): 37.
- [20] 肖铁肩. 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 [21] 金安平. 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22] 萧云岭. 论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失败[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1): 15-17.
- [23] 蔡寄欧. 鄂州血史[M].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58.
- [24] 孙中山选集(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25] 吴相湘. 孙逸仙先生(第一册)[M]. 台北: 中正书局, 1971.
- [26] 杨玉如. 辛亥革命先著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27] 道格拉斯·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A re-analysis of the reason that Sun Yatsen regarded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 as a revolutionary party rather than a political party

XIAO Tie-jian, TAN Xian-l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n410083, China)

Abstract: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 was the first capitalist political party with the nationwide scale established by Sun Yatsen, Huang Xing and so on. Sun Yatsen regarded it as a revolutionary party rather than a political one. On the problem, history educational circles carried on a study according to Sun Yatsen viewpoint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political one. The author believes the problem that Sun Yatsen regarded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 as a revolutionary party rather than a political party wa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is problem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ngles: Euro-American political party which Sun Yatsen followed has not provided the type that revolutionary party was viewed as a political party; Japanese government called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 led by Sun Yatsen, a revolutionary party; the influence of the argument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improvement one; and the strategy that makes use of Hui Dang as well.

Key words: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 revolutionary party; political party; reason

[编辑: 颜关明]